

代序

失去了除夕的十年

本書收集的，是我近年在報章的時論專欄中寫下的較為感性的文章。分三部分，第一部分是寫自己的前塵往事。一直有讀友催促我寫回憶錄，我陸續續寫了些舊事，可以說是對回憶錄作的準備。第二部分是對香港故人與往昔的回望。第三部分是一些藝文雜說。二〇一八年底，我寫了一篇《歲末絮語》，從十年前的除夕夜，聯想到今時今日今夜。現在將文章增補修改，換一個題目，就作為本書的前言。

* * *

十年前，我開始沒有了除夕。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，關閉了的窗戶隱約傳來慶賀新年的聲音，被我無意識地隔絕了，我聽到的

是自己哭泣的聲音，因為那天早上，相伴半世紀的妻子離去了。

從此以後，我就沒有了所有送舊迎新的除夕活動。十年來，都選擇一個人在家靜靜思念，翻翻老照片。這一天不想被打擾。就這樣一晃，「生死兩茫茫」了十年。

孤獨，很少人喜歡。人是社會動物，若沒有了人與人的社會聯繫，孤家寡人一個，就會感到寂寞，而寂寞會讓人發慌。不過，孤獨不等於寂寞。孤獨是一種處境，寂寞是一種感覺。孤獨的處境，未必就有寂寞的感覺。

獨自一人處在美麗的大自然環境中，靜靜思考，浮想，面對真正的自己，回顧過去，思想未來，那就不會感到寂寞；獨自一人陶醉在樂聲中，或閱讀一本好看的書，那樣也不會感到寂寞。相反，如果一個人處身在一大堆與自己格格不入的人群中，對無聊談話感到厭煩，那麼即使周圍有很多人，你仍然會感到寂寞。

丹麥作家齊克果在一八三六年的日記中，這樣寫：「我剛從一場派

對回來，我是派對上的活力與靈魂：我字字珠璣，人人都因此歡笑，崇敬我，但我走開，我在這篇日記裏確實需要用到如地球軌道一般長的破折號——我想一槍斃了自己。」這是在虛偽應酬中對自我感覺良好的極度厭惡，厭惡到想一槍斃了自己。

那是一個真正面對自己的作家，在恭維聲、在虛偽世態中的寂寞感。社會上的許多人當然不是這樣，故屈原有「世人皆濁我獨清」之謂嘆。我沒有齊克果或屈原這樣清高脫俗。在香港，我有不少朋友，其中有好朋友，也有許多愛護我、認同我的寫作並一直有聯繫的讀友。我不感寂寞，無論是在與友好相處或獨處的日子裏。

但觀看香港，這個我生活了七十年的地方，看一些過去的朋友，一個個在醬缸中被權勢玷污而變得越來越奇形怪狀的臉，我不禁想起捷克詩人P. M. J. K. 的詩句：「當互相嫌惡的人，／不得不共睡一床的時候，／那時寂寞與河流同行……」

這些年，香港的政治環境，讓我感覺到越來越像跟厭惡的人共睡一

床。一些佔據高位的、變形的、翻着白眼或不斷霎眼睛的說謊者，講着比粗口更難聽的荒謬言辭，真是連唾罵都覺得是侮辱了自己的智慧。感覺曾經如此可愛的香港不斷被玷污，「那時寂寞與河流同行」。

二〇一八年最後一天，老婆的十年忌日。二〇一八，是許多名人離去的忌年：有死而無憾的，也有我覺得死而有憾的。二〇一八，令人不斷想起卡夫卡的《審判》：約瑟夫·K被捕，被審判，被處決，他的罪名就是他的清白。因為社會上的人都有罪，有罪才可以做人，清白就遭審判。二〇一八，使我們對香港的希望越覺渺茫。二〇一八，記錄梁天琦青春歲月的電影《地厚天高》中，留下一句迴盪整年以至未來的話：「我無能為力扭轉這局面，唯一可做的，只有令自己變得更好。」

沒有明天，那麼在淡紅血色中的微茫希望，就只能夠是令自己變得更好。更好的意思就是忠實於自己，就是莊子所說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」。即使如我般老去，也要掌握每一天活着的日子。

十年前的歲末，我失去了除夕，邁向新一年的交接點聽不到午夜禮

炮聲，聽不到倒數聲，聽不到相互祝賀聲。接下來的十年，香港也像是失去了除夕，那些往日令人興奮的聲音好像越來越黯淡了。一個人們不忍說出來的原因，就是不能期望有個較好的新的一年。在沒有明天的狀態下，歡聲趨於寂滅，寂寞與河流同行。

回望

父親	／ 014	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	／ 046
關係	／ 018	三家姓奴才的心路歷程	／ 050
人生交叉點	／ 022	不畏權勢與不畏群情	／ 054
理想破滅的悲哀	／ 026	愛國是虛假的，權力是真實的	／ 058
我的六七體驗	／ 030	愛國的變味	／ 062
在權力邊緣遊走	／ 034	愛與恨	／ 066
一九七一這一年	／ 038	符號	／ 070
昔日人生大轉折	／ 042	中秋的省思	／ 074

那些年 這些年

往事與近事	／ 080	昔人已乘黃鶴去	／ 114
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	／ 083	奇談妙論	／ 118
香港的宿命	／ 087	北海道去來	／ 122
懷念一位故人	／ 090	四十多年前一個念頭	／ 126
道路、真理、生命	／ 094	立場	／ 130
八一八的記憶	／ 098	《文匯》今昔	／ 133
語言與政治	／ 102	那些年 這些年	／ 137
《香港X'mas》	／ 106	氛圍	／ 141
金庸與我	／ 110		

不一樣的心靈觸動

三種境界	／ 146	下不為例	／ 185
名言	／ 150	是枝裕和	／ 189
不一樣的心靈觸動	／ 153	血緣社會	／ 193
審判	／ 157	大哉問	／ 197
永藏心中的城市	／ 161	不能少，不能說，不能想	／ 201
異鄉人	／ 165	新世代的責任更大	／ 205
國家即國民	／ 169	本土電影和《點五步》	／ 208
平凡人的覺醒	／ 173	對決	／ 212
惟有勇氣才是永恆	／ 177	赤子之心	／ 216
成與敗都不是終結	／ 181	極夜後	／ 220



回望

父親

現在大概只有我這樣夠老的人才在童年經歷過抗日戰爭。有記憶的年月，已是四五歲在淪陷區的上海，那時靠父親靈活應變手腕，我們一家在汪政權下過着還算富裕平安的日子。然後有一天全家倉皇逃難。我在名采（編按：報章副刊版）寫過一篇〈九歲那年〉。七十年前的畫面，是我人生記憶的第一個零光片羽。那天深夜，一家人鋪一塊布躺在河灘上，仰望繁星密布的夜空，沒有再去幻想星星是否有生物、星星更遠處是否還有天外天，而是腦子裏反覆迴旋着那一天所看到的人世苦難。一日間，覺得自己長大了。

戰後，父親突然成為「接收敵產」的大員，在瀋陽、長春接管戲院。我們也先在上海，後到北平生活。一九四六至四八年，中國動盪，國民政府貪腐，通貨崩盤，內戰爆發，由共產黨暗中組織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。國民黨在東北戰敗，父親也撤離東北，他先到香港，而隨後母親也帶着我們於一九四八年重回香港生活。

父親大半生飄泊流離，一家人也跟着他流轉。

不久前讀到中文大學出版的《粵語的政治》一書，講到一九三〇年代有聲電影日漸流行，而當時的南京中央政府開始推廣國語運動，想要禁制粵語片，香港就在一九三五年發起「粵語片救亡運動」，書中寫：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，在粵片界名人李化（我父親）……等號召下，三百餘位粵片影人聚集於香港一酒家……發表聲明」。又記載一九三七年七月，香港華南電影協會（父親任秘書長）派代表五人到南京請願緩禁粵語片。父親是其中之一。但隨即中日戰爭爆發，南京遭日軍進襲，禁粵片之事不了了之。

一九三六年，我出生那一年，父親為粵語片的整體權益奔走忙碌，

那年他二十七歲。另有一書，記載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，日軍空襲廣州，當時我父親率領一個攝影隊，冒充襲危險到廣州拍攝空襲中人民的輾轉。

在我叔叔李剛（離休時位居中國文化部藝術局局長，二〇〇七年去世）的回憶錄《歸處何方》中，記載他少年時代，是父親安排他和他姐姐輾轉奔赴延安參加中共革命救亡事業的。

我沒有同父親談過他的往事，但從一些記載來看，他年輕時應該是有理想的熱血青年，左傾，愛國，熱心公眾事務，後來與汪政權、國民黨、共產黨有聯繫，都是不得已地為了在強權下謀生計。來港後，他不斷向中共組織靠攏，一直以左派影人自居，參加中共領導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組織活動。但中共秘密檔案中，大概一直把他視為歷史背景複雜的人士，對他從不信任，而且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風分子黃若海時，中共《戲劇報》還給父親戴上一「漢奸、中美合作所特務」的帽子。儘管《戲劇報》在香港發行時，把這個稱號塗黑，但那時我

接觸的香港共幹談到父親時，還是帶不置可否的口吻。

父親是導演，更是製片家，擅長對付三教九流人物，但一生離不開在黨派權力下輾轉。一九六六年文革，六七年暴動，左派影事走進死胡同，父親的電影事業也撐不下去，於是躲到澳門省吃儉用吃老本，一九七五年鬱鬱以終。

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二日

關係

父親的妹妹廣東人叫姑姑，姐姐就叫姑媽。我的姑姑李麗蓮跟爸爸關係最親。

上世紀二三十年代，姑姑是上海有名的影星和歌星，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同江青一起投奔延安。她那時已是中共黨員。到延安後，她與共產國際派駐中共的軍事特派員德國人李德（原名Otto Braun）結婚。李德在一九三三年曾掌中共蘇區的軍事指揮大權，紅軍第五次反「圍剿」失敗，中共後來指稱是李德在軍事方面排除毛澤東的主張所致。代表共產國際的李德在當時中共的地位崇高。

李德於一九三九年奉命返蘇，姑姑與他的婚姻關係也告終了。但她

在延安仍然是紅人。據我後來在上海書局工作的同事、曾在延安生活過的吳藹凡說，當時大家都知道，李麗蓮常在中共領導人家中走動。她自己也告訴過我，當年常跟毛主席打麻將。抗戰爆發後，父親把只有十多歲的一弟一妹輾轉送去延安投靠她。弟弟是我叔叔李剛，他在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學大提琴。他說有一年過年，他整天待在老毛的窯洞裏。姑姑後來在延安跟戲劇家歐陽山尊結婚。

戰後國共停戰時期，我家在上海，李麗蓮同歐陽山尊從延安來上海做文化統戰工作，他們一起演出了延安小歌劇《兄妹開荒》，每天忙着與文化人來往，晚上回家常有國民黨特務跟蹤。後來我們搬去北平，山尊姑父作為國共和談的共方小組成員有時到北平開會，他和姑姑沒有放過任何機會跟我們家的每一人宣傳共產黨，我雖然只有十一二歲，也知道了毛主席和共產黨。

中共建政後，姑姑長期在全國婦聯國際聯絡部任副部長，姑父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，後來二人離異。姑姑在一九六五年去世。

同中共高層的密切關係，並不能保護姐姐的妹妹、被送去延安投靠她的我的三姐姐。我們一直以為三姐姐在延安是病死的，直到叔叔李剛在回憶錄中才透露是在延安時期中共的「搶救運動」中，被懷疑有歷史背景問題被鬥爭，其後才病死，死時十六七歲。

一直同父親有聯繫的姐姐，也未能為父親在胡風運動中被指為「漢奸、特務」置一詞，反而為這個無根據的指控，跟父親保持距離，令父親有點傷心。

叔叔李剛在中共建政後，從大提琴手轉為行政幹部，擔任歌劇院院長。他十四歲就去延安的紅色背景也沒有辦法使他躲過文革的殘酷批鬥。

亡妻梁麗儀的父親是中共一九二九年在香港的地下黨員，根正苗紅。她一九七〇年遭隔離審查。我當時向中共在港的領導人反映，無一言回應，連安慰的話也沒有。羅孚、羅海星都是中共黨員，被拘留判刑都沒甚麼證據。程翔跟中共關係不淺，出事時投訴無門。李波夫婦也

如此。一個充滿敵情觀念的組織，組織中人都互相猜疑，對組織外的人平日統戰言笑晏晏，一旦被懷疑、誣陷，誰都幫不了忙，甚至要撇清關係。專權政治下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。

我當年曾對共產黨員感覺神秘崇高，看多了覺得自己真是幼稚可笑。多少年了，現在還有人吹噓他同中共高層的關係，而且仍然有人相信，我笑不出來了。

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三日